当代中国小农经济解体的历史趋势和延缓解体的若干因素（下）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当代中国小农经济解体的历史趋势和延缓解体的若干因素（下）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全文目录

一、土地流转的趋势

二、农业资本主义vs小农经济

三、专制政府在当前农业领域扮演的角色

四、小农何以“无产化”？

五、农民的意识形态

六、简单的总结

四、小农何以“无产化”？

尽管马克思主义预测了小农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总体趋势，但是各个地区这一进程的发生途径和速度可能有着很大的差别。例如，列宁就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农业转型中“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的区别。

首先应该看“小农”的来历，是农奴、佃农还是独立小农。分田到户后的中国农村，没有大地主、承包土地相对平均、最终所有权属于集体。土地面积和经济水平除了不同生产队之间基础条件的系统性差异，在生产队内部只有因人口数量和结构导致的分化。由于二轮承包后增减人口都不调地（各个地区有所不同），姐妹多的家庭在她们外嫁后就会留下较多地，兄弟多的家庭在分家后只剩下很少的地，而他们结婚生育后也没有多分到地。那些地少以至难以糊口的农户，反而更早踏上外出务工闯荡的道路，其中一小部分发家致富，大多数则成为了“农民工”。这个称呼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户口的烙印，还在于他们并没有完全与农业、农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意义上，农民的无产化可以从农业领域和非农领域发生，并且具有显著的代际性。

（1）农业领域

对于规模农业而言，部分无法以机械代替的环节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例如搬运、日常管理，而对于某些高附加值农作物的管理，比如果树剪枝、水果套袋、蔬菜收割，对劳动力的技能也有较高要求。不同的农业类型中，雇佣劳动率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别，高附加值的新型农业往往比传统的大田农业要高，在雇佣本地人遇到问题的时候，还要寻找外地的劳动力。

前面说到，大农场面临着雇佣工人上的难题。农村并不是缺乏剩余劳动力，只是因为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大多外出务工，在村的一般只有难以外出务工的老人、在家带小孩的妇女，以及少量能够在家附近就业的男女劳动力，自己家里一般也还有在种地。从雇主角度来看，这显然不是什么理想的劳动力，不少人要兼顾带孩子、家务活、自家农活，不能随叫随到，老头老太干活慢、又怕出事，天气热了不敢让他们干。另外，由于农业本身利润低，他们也不舍得出高价雇工。近年来由于找不到人，他们才被迫一点点抬高工价，机手从两百涨到三四百，杂工从七八十涨到上百。

杂工一般只有50至70岁的中老年人。他们可能是独自找活干，也可能亲戚或同村人组成一个团队，有些专门被一个大农场、大户雇佣，有些则不定地在从小农户到大户之间提供服务（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搬运装卸这样的纯体力活（类似建筑活）基本都是男性，打药、撒化肥的男性多一些，这些都属于计件工资，而更为精细的田间管理绝大部分是女性，这些以计时工资为主，一天算一个“工”。可能是男性气质阻碍了他们“屈尊”去干一些女性就可以干的活，正如有些男性在自家农活中也把除草这样的事情丢给他们的妻子。这些中老年男性如果找不到技术活或者体力活——相对而言工资也确实高一些，宁可在家赋闲。而女性相比之下是更加勤劳的，她们不仅有沉重的家务劳动，照顾小孩或老人，还努力在农村范围内寻找可以赚工资的机会，尽管相当微薄，但至少够农村开销，这也提高了她们在家庭内部的地位和自主性。

当前农业中的杂工是从小农中分化出来的，这取决于几个条件：自家土地太少或土地流转、政府占地等失去土地，甚至不足以在农村养活自己，因年龄或身体原因缺乏进城务工的条件，并且无法或不希望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他们具有鲜明的代际性，与三年困难后的生育高峰赶上老龄化（特别是退休年龄限制）有着密切关系。与之平行的是，近年来正在出现一批要回土地的返乡农民，如果是农户间私人流转的就能很方便地要回，但被规模经营主体流转、签订长期合同、打掉田埂后，要么要回的难度就比较大，要么就只能接受调地。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意义上的小农，只是其中一些因为缺地而不得不成为农业雇佣工人。

农业中的技术工，以机手为代表，则有着显著不同的来源和特征。开机器不仅需要技术知识，或者经验手感，还很消耗体力，所以其主体是中青年男性，而老一代机手已经难以驾驭大型机械。一部分机手没有机械，平常从事其它行业，只是农忙时回来给人开机器。这类机手实际上并不占优势。一方面，他们一般来说是按日结工资，也就相当于外出务工的收入，他们会逐渐发现农忙返乡其实不如留在城里打工；雇主也常常不满于他们不认真保养机器（毕竟不是自己的）、干活质量不尽如人意（毕竟拿的是固定工资）。自有机械的机手则应该归入小资产阶级，他们往往在方便自家种地使用的同时也给周边小农户或者规模农场提供服务，毛收入更高但成本自负。插秧机、拖拉机的机手基本上是本地人，但还有一批常年跨地区作业的全职收割机手，一般称为“稻客”、“麦客”，相比于本地的季节性机手，机械更精良、技术更熟练、收费也相对较低。在未来小农衰落、土地集中化的情况下，他们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很可能向农业资产阶级转型，自己包地来种，或者作为技术管理人员整合在规模农场中，即使具有雇佣劳动性质，也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2）非农领域

农民的无产化，很大比例上发生在农村之外，即城市的务工场所。我们这里不去讨论行业分布问题，因

为这将涵盖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建筑工人）、小资产阶级（不仅包括小业主，还应纳入服务人员等新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包工头、老板等）。无疑，城市使得在农村本不那么显著的阶级分化和矛盾变得更加突出。要判断农民无产化的趋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不同代际的农民工的打工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

上文中提到的第一代农民工，一般是60后、70后，男性占大多数，以季节性流动为主，由于文化程度很低，做的主要是纯体力活，典型工作是建筑工地，常年在外的比例并不高，有些是农忙时返乡，有些是农闲时才出去打打零工。他们当过农民，熟悉种地，即使外出务工半辈子，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土地流转出去，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归宿是家乡，对土地有感情。第二代农民工，以80后为代表，常年在外务工的比例明显提高，典型工作是进厂，农忙回家对于一些家庭还有必要，但农闲时才外出的基本上仅剩小部分妇女。他们可能小时候接触过一些农活，但十几岁（初中毕业或肄业）就外出打工，并没有真正种过地，与土地的联系已经很微弱，只是对农村社会关系还有一些认同。由于大多数难以在打工的大城市立足，在农村又不可能给子女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不少人会选择将积蓄投入县城购房。第三代农民工以90后为代表，无论是初中生、职校生还是大学生，基本上与土地绝缘，不仅从没种过地，甚至连自家的地在哪都不认识，对于农村的社会关系也知之甚少。他们在文化认同上已经趋向于城市，更愿意选择不那么脏和累的活，男性中从事建筑、装潢、机修等极具传统男性气质的工作的也并不多，一部分进厂，其余则投向服务业，男性常常选择厨师、理发等，女性则有许多成为了营销或服务员。职业的选择也寄托着上一代人的期望，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务农，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则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打工，就算阶级地位并没有实质改变，也不要过得像自己那么辛苦。

目前小农户的主力是50后、60后，尽管70岁以上的老人将逐渐退出农业，但仍然有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但根据农民工的代际结构，我们可以预测，再过10～20年，农村和农业的构成将发生巨变。届时，人口最多的60后将退出土地，而更年轻的农民工，无论是从人口、农业技能还是返乡意愿来看，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小农将在中国走向消亡，当前土地规模化的主要阻碍因素将不复存在。当然，中国未来的“大农场”也很难达到美国那样的规模，而会在上百亩到数百亩间，农业中的雇佣工人的规模不会太大，而资本和技术的密集程度会进一步提升。

通过城乡之间的对比不难看出，农村的阶级斗争是不开展的，甚至是受到阻碍的。在农村，由于农业雇工尚未取代小农，农业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小农户之间的纠纷。在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中，如果双方都是本地人，劳资矛盾又会因为村庄社会关系而削弱；当雇主或雇工至少一方是外地人，类似于城市的劳资冲突才更容易爆发。另一方面，进城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很少能够波及老家，往往只是在过年回家时作为事件被提及。

我们同样需要看到，国家将农村视为劳动力的“蓄水池”，正是利用了农民工无产化不充分的情况。在农村，农民靠微薄的务农收入不足以完成家庭再生产，迫使他们进城打工，成为其收入主要来源；在城市，他们在生产场所被剥削剩余价值，又不得不付出更高昂的生活开支和房租，乃至务工收入不足以支撑一家老小在城市生活，结果非劳动力人口（老人、小孩）乃至部分妇女不得不返回农村，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家庭再生产；由于农村的存在降低了农民工家庭生活成本，城市雇主又可以进一步压低他们的工资水平；由于相对农业收入更高的务工收入补充家用，农资（种子、化肥、农药）和农机的费用也水涨

船高，也就是说农工业资本家间接地转移走了小农户本已微薄的利润。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家庭而言构成了一个吊诡的循环，他们无论是仅仅在农村老家，还是仅仅在打工的城市，都难以在经济上真正立足，被迫在城乡之间来回摇摆，但是“工农兼业”与其说丰富了他们的家庭收入，不如说是相对贫困化的写照。专制政府和资本家联手，从农民工身上薅了两遍羊毛，还假仁假义地对他们说，经济景气的时候，你们可以来城里多赚钱，改善生活，经济下行的时候，你们还可以回农村种地，不怕挨饿！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五、农民的意识形态

关于农民的意识形态属性，经典作家常常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典型而从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方面是落后的小生产者形象，孤立、封闭、保守，以私有意识抓着仅剩的一点土地不放，徒劳地抗拒大生产的浪潮；另一方面是受盘剥者、受压迫者的形象，作为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盟友，具有反专制、平均地权等斗争的诉求。无论是进步还是保守，都是特定的阶级斗争态势下的结果。对于当前的中国农民，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从不同的维度来解析它。

（1）民粹主义

农民对于国家的看法，主要是基于当权者对待他们自身的方式，以及自己在当前的生活水平。因此，他们的政治态度，可以从“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之间跳跃，但没有对整个政权的性质形成连贯的判断。不妨来看一下笔者所交谈过的村民对于中共历史上几位领导人的评价。直到现在，不少人家还贴着毛泽东的画像。尽管当地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很多人饿死，并且在人民公社时期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也很少因此直接指责毛泽东，而把饥荒归结于苏联逼债和地方虚报产量，相比之下，在反右或文革期间受到打击的人往往会直言毛泽东“太左了”。关于邓小平时代，虽然农民分到了地、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当然这其中有化肥使用和品种改良的功劳，对此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也不经常直接称赞邓小平，有可能是计划生育罚款和税收冲淡了他们对这一时期的好感。江泽民是几乎所有农民指名道姓痛骂的对象，因为这一时期超生罚款和农业税是最严苛的，几乎把他们逼到了无法生存的边缘。因为取消了农业税，还给农民发放补贴，同时物质生活条件也在改善，农民对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的评价普遍不错。

从当前阶段来看，农民对国家仍然存在一些显著的不满，但这些不满一般局限在特定的领域内，很少将其串联起来，把矛头指向国家本身的性质，此外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代际差别。老年人是最安于现状的群体，因为他们以前挨过饿，衣食不愁足以让他们感到满足，最大的问题在于养老，养老金太低、缺乏人照顾。中年人，由于担负着全家老小的开销，最关注的是生计问题。相比于劳动本身的辛苦与恶劣条件，他们更担心的是收入。对于打工者而言主要是拖欠工资、被五天八小时或停工放假，当然还有工伤；对于小商贩乃至包工头、老板，问题在于没生意可做。疫情期间，因封控没有收入吃不上饭的打工者、无法做生意而亏损惨重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乃至因收入骤减而断供的人，对政府的官僚主义有最多的不满，但这种愤怒的控诉并没有上升到反专制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生活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像教育、结婚、买房买车、大病医疗等，以及贫富分化，有很多的抱怨，但由于他们并不能跳出“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合法性，所以也很难上升到“从何着手”的层面，通常会归结为自己没有能力，或者寄希望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改良。总之，他们可能在具体民生问题上是激进的，但在最终目的上是保守的，即经营好自家的小日子。最后是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劳动条件的好坏，例如工作的

辛苦程度、加班与休假、规章制度、上级的态度，有着不亚于收入水平的关注，因而在斗争意识上可能会比上一辈有所提升。不过，对父母经济支持的依靠、个人阶层跃升的思想，会阻碍他们的不满转化为阶级意识。只有当自己逐渐在工作中更深地感受到生存的压力、认识到自身在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时，才能将个人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真正联系在一起，而实现这种可能的过程中政治教育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可以看出，这样的民粹主义与列宁时代的俄国农民、解放前的中国农民有着明显的区别。从土改到分田到户，已经消除了土地革命的动力，即使一度经历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复辟后黑帮所进行的政治教育使得人民公社时代的理想被许多农民视为一个失败的乌托邦。贫富差距又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且由于农民对真正的统治阶级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于是在农民的认识范围内，贫富差距虽然引起了一定的不满，但仍然可以用个人奋斗的逻辑来解释。许多农民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阶层跃升，而并不认同于自身所处的阶级。他们不经常直接指责资本（许多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而会这么做），对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缺乏认知。这是因为，他们往往身处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首要的担心是失掉就业机会和收入而彻底陷入贫困，他们会误认为，自己的就业和收入情况，是与“经济形势”绑定在一起的，只有希望经济不断发展，自己才能分到一杯羹，哪怕这个“经济”实际上是以他们的剩余价值堆积起来的。因此，这种“民粹主义”诉求实际上是一种受到资产阶级支配的个人奋斗意识形态。

（2）沙文主义

在农民意识形态方面，相比于他们民粹主义的个人奋斗幻想，更值得警惕的是他们的沙文主义倾向。即使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人品得到许多认可的人，甚至在民生问题上显得相当激进的人，一聊到国际政治，也往往表现出狂热的民族主义症状。他们的主要矛头指向了美国、日本、台湾，涉及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美日等国挑动台独、“境外势力”渗透等等，并且口头上强烈支持武统台湾。他们其实也不希望战争真的打起来，否则中国的经济要倒退一二十年，自己的安稳日子也过不下去了。但是，他们会因为这样的“境外势力”威胁，加强对中特体制的认同和依靠。“家国一体”的传统中国意识形态以及“国族危机”的近代史叙事被重新激发，转化为对“一党制”优势的肯定，对“中国不能乱”的辩护，对“伤害民族感情”行为的声讨。在俄罗斯侵乌战争期间，他们普遍表现出对俄罗斯的同情，将其归结于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的挑唆，大概是感受到了中俄帝国主义之间唇亡齿寒的处境。另外，汉族沙文主义在当前的民族主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维护这个国家的动力并没有那么强烈。

不得不指出，黑帮在意识形态欺骗上是相当有成效的。电视、手机等的普及，让那些常年不出村甚至不识字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每天听到沙文主义的宣传。从央视新闻到“国师”、专家，再到不知名的自媒体博主，都在传播着沙文主义。在农村人口中，三四十岁以上的男性是最热衷于谈论政治的，也是沙文主义的重灾区，并且试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解释国际冲突。相比之下女性虽然也受其影响，但不那么狂热，更多是因为认为中国“被欺负”而感到愤怒，对男性眼中的那套丛林逻辑并不算感冒。

在帝国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形势下，落后群众的沙文主义倾向无疑将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敌人。这些落后的群众会把宣传“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敌人在国内”的革命者立即当成汉奸卖国贼痛打。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战争爆发初期，沙文主义倾向会达到顶峰，直到战争悬而未决的后果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而特色黑帮除了把越来越多群众当炮灰以外提供不了

其他出路，才可能普遍对黑帮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而在群众开始出现离心趋势时，黑帮国家机器的镇压将空前强化，这将成为决战的时刻。

（3）性别与家庭观

性别与家庭观构成了农民意识形态中的另一板块。前面已经在农业、打工等方面指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这里我们将从家庭的层面来讨论。

父权制家庭的传统尽管对于年轻一代已经有所淡化，但他们的长辈仍然对彩礼、从夫居、生子看得非常重，经常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小孩带小孩、动辄离婚，对于非传统的性别表达乃至性少数更是相当排斥。大多数年轻人还是会在长辈或同辈压力下步入婚姻，并且不得不依赖于他们的经济支持，但也在想办法逃离家长的干涉，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就是最好的出路。特别是对女性而言，一旦她们面临生育，很可能会在雇主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丢掉工作，回到婆家待产，生产后多久才能放下小孩再次外出也是未知数，最坏的情况是就此成为“留守妇女”。因此，大多数农村女性，特别是缺乏高学历和正式工作的女性，是没有“职业生涯”可言的，每当家庭需要时，她们的独立性就会被首先牺牲，而被迫依赖于男方收入又降低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话语地位。许多年轻女性结婚时要求在城里买房，在生完小孩后想办法把小孩丢给公婆带，自己进城打工去，就有争取独立性的意图。

不过，女性也有自己的最后手段：离婚。有数据表明，女方主动要求离婚相对更为常见，占70%以上【参见：http://www.cnwomen.com.cn/2019/11/15/99180461.html】。在农村，除了到民政局正式办理离婚，还有很多（特别是外地媳妇）是直接“跑了”，不论之前是否领过结婚证。由于计划生育时期的婴儿性别选择，农村地区男女比例失衡严重，尤其是90后，单身的压力才让男方不得不做出一些表面上的让步。因此，在离婚冷静期问题上，男女之间、长辈和晚辈之间有着尖锐的冲突，男性和男方家长（有时还包括女方家长）形成了阻止女性离婚的“神圣同盟”。在这个问题上，相较于男性相对一贯的态度，女性的代际隔阂更加明显：许多中老年女性即使在丈夫有家暴、出轨或其他恶行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忍耐，更不用说那些被最广泛地归结为“感情不合”的事由——家务分工、话语权、经济权、思想观念等，以及男方家庭的贫困，结果是她们自杀和信教的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年轻女性由于教育程度、经济地位、自主意识的提升，对于这些行为的容忍度明显降低，她们不再担心离婚后失去依靠，不愁再嫁是其次，关键在于能够更好实现经济独立，所以愿意争取子女抚养权的也不在少数。

因此，在审视阶级矛盾中不能忽略性别的维度。在农村工作中，有必要对农村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予以特别的关注和支持。尽管相对于城市中产女性而言，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的政治意识还相对滞后，但她们受到的压迫更深，无论来自工作方面还是家庭方面都是如此。她们当前的诉求，第一步是反对男性以及父权制家庭的侵害和限制，获得经济独立，第二步是在工作领域争取平等的待遇，明显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我们很难去指责她们把问题归结于“性别对立”，或者把出路简单定位于“经济自由”，她们可能比不少城市中产女性更加意识到性别与阶级的关联。毕竟，还没有人跟她们讲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而女性的无权让她们不得不从头开始争取这些东西。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是极度缺失的。

六、简单的总结

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上文的一些主要结论。随着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虽然已经相当普遍，但没有相对于小农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造成了多种经营主体共存与竞争的局面。专制政府出于压制阶级斗争、稳定政权的目的给小农一定补助，但支持力度在向规模更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主动加速农业的变迁。农业领域的雇佣劳动很难达到工业、服务业的规模，后者才是农民雇佣化的主要去向，其中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这使得10～20年后小农将逐渐消失。意识形态层面，相比于不彻底的民粹主义，沙文主义倾向尤为值得警惕，另外应该在家庭中注意到性别与代际的差异，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的革命潜力应该更多关注。

最后谈一下研究农村问题的意义。如今的农村相比于城市并不是阶级斗争的中心，甚至可能是保守的，但是它却向城市不断地推送着潜在的无产阶级力量，自身也在发展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从城市工人阶级这端来看，正如“农民工”这个称谓所揭示，他们的起源并非无关紧要，他们与村庄与土地的联系、从原生家庭继承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影响着他们的阶级行动。但是，由于农民总体上属于小资产阶级，只是在大多数终将落入无产阶级的意义上，才被视为无产阶级的盟友。左翼对于理解这个“盟友”并没有足够的耐心，而急于让他们在政治上进入自身的革命轨道。只有真正了解农民的实际状况，有充分的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才能概括出他们的诉求，通过政治教育和组织发挥其民主主义的潜力。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中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部分觉悟的提高将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好力量。（完）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